

# 美日同盟轉型： 功能外溢、結構調整、趨勢與影響 (2017-2025)

巴殿君\* 王哈\*\* 耿菲蔓\*\*\*

목 차	
I. 引言	IV. 美日同盟轉型的趨勢與影響
II. 美日同盟轉型的理論闡述	V. 結語
III. 美日同盟轉型的功能外溢與結構調整	

| 논문요약 |

內容提要：2017年至2025年間，在全球權力結構深刻調整、東亞安全環境持續緊張、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日同盟經歷了顯著轉型，在外部功能、內部結構與地區影響等層面發生轉變，美日同盟由傳統防禦性同盟轉向了具備區域塑形能力的复合型戰略同盟呈現出功能外溢、結構調整等特征。美日同盟功能外溢，表現為軍事功能的前置與外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議題擴容”；美日同盟的結構調整，表現為同盟由“高度不對稱”向“准平等分工”的漸進演化。高市早苗上台後，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演化為美日同盟轉型提供制度性支撐，同時，美國完成了對“印太戰略”的制度化推進，美日同盟轉型具備階段性定型特征。未來，美日同盟將朝着戰略部署軸心化、同盟管理現代化與軍事安全一體化方向持續轉型，這一進程也將對地區安全環境與中國和平崛起造成不利影響。

▪ 關鍵詞：美日同盟 同盟轉型 印太戰略 制度重塑

\* 第一作者：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中心 副主任，教授  
 \*\* 共同作者：吉林大學 東北亞學院 博士研究生  
 \*\*\* 共同作者：吉林大學 東北亞學院 博士研究生

## I. 引言

21世紀以來，國際戰略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中美戰略競爭持續加劇，亞太地區成爲全球地緣政治和戰略博弈的核心舞台。在這一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地位、功能與結構經歷了顯著轉型，成爲理解區域安全、分析大國關係和評估中國戰略環境的重要研究對象。2017年特朗普首次執政之後，美日同盟作爲美國“印太戰略”牽制中國、掌控印太地區的重要支撐，發揮關鍵作用。美日同盟功能由傳統安全軍事防禦延伸至經濟安全、技術標準、價值觀傳播等領域；美日同盟機制嵌入區域多邊框架，美日推動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等機制化合作，不僅對中國和平崛起形成了多領域、全方位的挑戰，也對區域秩序帶來了溢出性影響。2025年特朗普迎來二次執政，在其執政初期便發起了對華關稅戰，不僅對中美關係良性發展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而且其關稅政策也對盟友帶來不小打擊。儘管美日同盟存在一定利益分歧，但其整體仍呈現強化的趨勢，這源於美日同盟機制演化過程中同盟的多層級關係嵌套和鏈接，使美日同盟持續穩固。

2017年至2025年，美日同盟在結構性壓力增強與權責分配變化的影響下，出現外部功能外溢、內部結構調整等變化，呈現出美日同盟由傳統防禦性同盟向具備區域塑形能力的复合型戰略同盟轉型的特征。首先，美日同盟的外部功能明顯擴展，其軍事安排已由單純本土防禦轉向“區域前沿存在”，遠程打擊能力、聯合指揮體系及跨域作戰能力不斷強化。同時，非軍事議題逐漸納入同盟框架，包括經濟安全、供應鏈重構、關鍵技術管控以及規則制定等，標志着同盟從單一軍事合作平台向多層次戰略制度網絡演進。其次，同盟內部結構發生了權責再分配與功能重塑，日本在政策倡議、能力投入與地區議程設置中的主動性顯著增強，呈現出“准平等伙伴關係”特征。這種變化既體現了日本國家戰略自主化的追求，也反映出美國在全球戰略再平衡中對同盟體系功能优化的外部推動。第三，同盟轉型的過程顯示出內外動力的疊加作用：美國通過制度化同盟運作和議題擴容實現戰略成本分攤與全球戰略布局优化；日本則在政策突破與戰略自主中提升政治話語權與行動空間，形成美日同盟功能與結構同步升級的格局。

## II. 美日同盟轉型的理論闡述

若以單一同盟理論的視角解釋美日同盟轉型，傳統的同盟理論以軍費增長、軍事協作頻率或政策協調密度作為衡量標準，固然可以說明美日同盟在2017—2025年間持續強化，却難以解釋其功能外溢、制度擴容以及角色再分配等深層變化。就美日同盟而言，其“轉型”并非簡單的條約修訂或軍事擴充，而是一個伴隨國際體系、區域安全結構與國內政治互動而持續演化的戰略—制度复合體的再配置。在理論上，“美日同盟轉型”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結構性與功能性并存的制度演化，體現出國家間權力關係、戰略目標與安全認知的重塑。

### (1) 同盟演化的三類路徑

從理論起點看，冷戰後關於同盟演化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類路徑：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威脅平衡”取向、制度主義的“合作—承諾機制”取向，以及建構主義的“身份—規範演化”取向。結構現實主義學者沃爾茲 (Kenneth Waltz) 指出，同盟是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下國家為維持權力平衡而採取的臨時性安排，其形成與調整取決於外部威脅與體系壓力的變化。<sup>1)</sup>這一觀點強調了同盟轉型的外生性邏輯：當國際權力分布或安全威脅發生變化時，同盟勢必進行結構性調整以重新實現均衡。沃爾特 (Stephen M. Walt) 進一步將“威脅平衡” (balance of threat) 概念引入同盟理論，認為同盟的性質與目標會隨威脅感知的強弱而變動，從而導致轉型的必要性。<sup>2)</sup>這意味着“美日同盟轉型”的首要內涵，是美國與日本在對外威脅認知與安全目標上的重新校准。

然而，僅以現實主義的威脅平衡邏輯不足以解釋美日同盟在和平時期的持續演化。制度主義學者如羅伯特·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與阿克塞爾羅德 (Robert Axelrod) 指出，國際制度的存在使國家能夠在非零和博弈中維持合作，通過規則、預期與信號機制降低交易成本與不確定性。<sup>3)</sup>對美日同盟而

1) [美]肯尼思·沃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M]. 信強,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126-127.

2) [美]斯蒂芬·沃爾特, 聯盟的起源[M]. 周丕啓,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21-25.

3) [美]羅伯特·基歐漢, 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M]. 蘇長和, 信強, 何耀,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50-52.

言，這種制度化机制表現為對安全承諾、情報共享、聯合行動程序的不斷細化與更新。換言之，美日同盟的轉型不僅是對威脅的被動反應，更是制度自我強化與路徑依賴的結果。<sup>4)</sup>從這個角度看，美日同盟的“轉型”體現為一種制度演化過程 (institutional evolution)：即在保持制度連續性的同時，通過增設功能、拓展議程、調整權責分配等方式實現適應性再平衡。

### (2) 同盟轉型的“權責再配置”

從同盟政治視角看，美日同盟的轉型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持續展開的“權責再配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并非單方面向日本施壓要求“更多負擔分擔”，而是通過制度設計與戰略敘事，逐步將部分地區安全責任嵌入日本的政策與能力規劃之中。通過強化聯合指揮机制、擴大情報共享、推動能力互操作性，美國在降低自身直接介入邊際成本的同時，維持了對同盟整體方向的主導權。日本則在這一框架下，通過主動承擔更多軍事與制度責任，換取戰略自主空間的擴展以及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政治能見度。由此形成的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種在高度不對稱結構中持續進行的再談判過程，其結果是同盟內部權力關係的漸進調整，而非根本性逆轉。

### (3) 美日同盟轉型三個特征

美日同盟轉型，即在國際體系與地區安全格局動態變化的背景下，美國與日本通過制度調适、戰略協同與規範重构等机制，對同盟的結構、職能與目標進行系統性再定義的過程，其具有一定的特征。

首先，結構性特征。在非對稱結構下，美日同盟的演化往往表現為美國主導下的“受控轉型”：日本通過政策自主性提升來平衡依附性，而美國則通過机制再設計來維系領導權。結構層面的轉型體現了同盟內部權力關係的再均衡，是轉型的基本表征。

其次，功能性特征。同盟轉型不僅涉及軍事防禦功能的變化，也包括政治、

---

4) Robert Axelro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J]. World Politics 1985, 38(1): 226-229.

經濟、技術等多維度的擴展。美日同盟轉型的功能性主要體現在從單一的防禦型同盟向綜合性安全合作機制轉變：合作領域從軍事威懾延伸至反恐、網絡安全、供應鏈、技術安全等新興議題。這種功能擴展的過程反映了同盟制度在面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時的自我適應能力。

第三，規範性特征。同盟的持續性依賴于共同規範與合法性基礎的重構。對美日同盟而言，冷戰後的“共同價值觀”與“自由開放秩序”話語，構成了同盟轉型的重要合法性資源。規範層面的演化表現為話語體系的再生產與制度化，例如在人權、民主、法治等議題上形成政治一致性，從而使同盟轉型具備觀念性支撐。

綜合上述三種視角可以發現，“同盟轉型”這一概念相較於“同盟強化”，更能準確概括2017—2025年美日同盟的實際變化。所謂“強化”，更多指向量的增加或密度的提升；而“轉型”則強調功能、結構與制度邏輯的變化。美日同盟在這一階段並非簡單地變得“更強”，而是變得“更複雜”：其戰略指向更為前置，議題範圍顯著擴展，內部權責分配趨於多層化。這一轉型過程，既是大國競爭結構壓力的產物，也是美日雙方在制度框架內進行策略互動與利益調適的結果。

### III. 美日同盟轉型的功能外溢與結構調整

從整體演進趨勢看，2017—2025年間的美日同盟已不再是戰後經典意義上的防禦性同盟，而是在功能外溢與結構調整的雙重驅動下，逐步演化為一種具備區域塑形能力的复合型戰略同盟。這一變化並非突發性轉向，而是通過多輪政策協調、制度嵌套與能力建設逐步完成，其結果是同盟性質與運行邏輯的實質性轉型。

#### 1. 美日同盟轉型的功能外溢

自2015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發布以來，美日同盟在軍事安全領域持續加強合作。2017年，日本在美國導彈防禦局（Missile Defense Agency 2017）的幫助下成功進行了首次SM3 Block IIA導彈攔截試驗。日本成功實施該導彈

防禦系統表明，美日同盟具備開發複雜的聯合防禦項目的條件。此后，美國和日本開啓了越來越多的項目計劃，這些項目計劃促使美日同盟更深層次地融合。2021年，日本服役了配備美國開發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BMD）和協同作戰能力（CEC）的第二艘瑪雅級驅逐艦（Vavasseur 2021）。2022年，日本航空自衛隊購買了三架美國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全球鷹”（Jenne 2022），以擴大日本未來的情報監視偵察（ISR）能力。日本在發展自衛能力的同時，還與美國協調建立了美日同盟的雙邊協調機制。根據2015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自2015年以來，美日同盟的核心是“確保無縫和有效的全政府聯盟協調”。2022年，日本政府發布了國家安全和防務戰略，隨後，日本迅速武裝自衛隊，使其能在充滿挑戰的安全環境中應對威脅。隨着日本積極進行國防建設，日本的國防開支已經大幅度增長。除了在反擊能力、彈藥儲備和自衛隊戰備方面進行重大投資外，日本還宣布對自衛隊進行重大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計劃在2025年之前建立日本聯合作戰司令部（J-JOC），以指導日本自衛隊的所有聯合行動。

### (1) 美日同盟明顯前置化与外延化

在功能層面，美日同盟首先完成了從“本土防禦”向“區域前沿存在”的躍遷。傳統上，美日同盟以“防衛日本”為核心功能定位，日本承擔有限的防禦責任，美國則提供延伸威懾与關鍵軍事能力支持。然而，隨着“印太戰略”的推進以及地區安全議題的泛化，同盟的軍事功能開始明顯前置化与外延化。一方面，日本通過發展遠程反擊能力、強化島鏈防禦體系、推進自衛隊与美軍的一体化指揮機制，使自身軍事能力不再局限于被動防禦，而具備對區域態勢產生實質影響的能力；另一方面，美日聯合演訓、聯合部署与跨域作戰構想的制度化，使同盟逐步具備在多個戰略方向同時發揮威懾与干預功能的可能性。這種功能轉型意味着，美日同盟已由“防止冲突的消极工具”向“塑造地區秩序的積極機制”轉變。

近年來，在裝備与技術合作領域，美日同盟正在构建深度融合機制。2025年10月，雙方在“國防工業合作、采辦与維持”（DICAS）框架下取得進展，包括探討“AIM-120中程空對空導彈的聯合生產”以及“美軍艦机共同維持”<sup>5)</sup>。2026

年1月，雙方進一步細化合作內容：推進空對空導彈（AMRAAM）和地對空攔截導彈（PAC-3 MSE）的聯合生產；加強供應鏈韌性，包括關鍵礦產領域的合作；探討大幅增加彈道導彈防禦攔截彈（SM-3 Block IIA）的產量。<sup>6)</sup>在裝備升級層面，2025年12月，美國國務院批准一筆約1億美元的對日軍售，專項用于升級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宙斯盾”作戰系統。此次升級涵蓋“海上作戰系統評估、軟件更新、系統集成”等核心內容，重點提升系統應對高超音速導彈的能力。同盟防禦體系的構建與升級，一方面體現出美日同盟在軍事領域的深度捆綁與融合，不斷加強雙方的互操作性，建立更加全面、細化的安全合作機制。另一方面，美日通過DICAS框架推進的聯合生產、共同維持，實質上是在構建一種“制度化的相互依賴”：當兩國的武器系統共享供應鏈，甚至導彈可以通用時，任何一方“拋棄”盟友的成本都將急劇上升。這種“鎖定效應”大大強化了同盟的持久性。

2024年5月10日，日本議會通過了修訂后的法律，在2025年3月底之前為自衛隊的地面、海上和空中部隊建立一個聯合指揮總部，以加強網絡空間等新的安全領域的威脅應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國總統拜登于2024年4月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會談，就審議自衛隊和美軍的指揮控制架構達成了協議。日本加強防禦能力建設與建立日本聯合作戰司令部的計劃得到美國的支持，此舉將大幅促進美日同盟在軍事領域的一體化。日本提升防務能力一方面抬高了自身在同盟中的議價能力，另一方面，日本的防務能力成為美日同盟前沿存在的一種補充性力量投射，強化了美日同盟的整體軍事力量、提升了美日同盟的威懾力度。

隨着日本軍事能力的發展，日本成為美國强有力的軍事伙伴，美日需要建立新的軍事結構來支持美日同盟的互操作性的強化與發展，美日同盟控制和指揮系統結構的轉變也會提高同盟的可信度與加強同盟在東亞地區的威懾力度。日本計劃發展“反擊能力”也使得美國和日本需要在戰略和戰術兩方面協調使用武力。在此背景下，駐日美軍將有可能大幅調整，美國有可能在日本建立前沿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作為日本新成立的聯合作戰司令部的常設以及日常對應機

5) Japan-U.S.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Summary).[EB/OL].Ministry of Japan,2025-10-29,<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5/10/4ab6149fd4e68a6271987229f9ce7ed3fb843a68.html>

6) Japan-U.S.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Summary).[EB/OL].Ministry of Japan,2026-1-15,<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6/01/e2fd534c81a42087e8511c8ca6961c1cbf863a46.html>

构。一旦日本聯合司令部得以啓動和運行，以及對應的美軍聯合司令部成立，美日可以實時規劃和支持聯盟行動，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美日同盟將具備更强的威懾能力。

軍事一体化標志着美日同盟從“松散協作”向“深度整合”的質變。以美日同盟指揮模式的轉變爲例，傳統的同盟指揮模式往往是“協商式”的——双方保持各自的指揮鏈，在作戰時進行協調。而当前美日的改革方向，則是向着“一体化指揮”邁進：駐日美軍指揮架构升級，意在增強其應對突發事態的快速反應能力；日本成立聯合作戰司令部，則是爲了實現陸海空自衛隊的統一運用。這種“双向升級”爲戰時“无缝協同”奠定了基礎。

## (2) 呈現明顯的“議題擴容”趨勢

美日同盟軍事合作的多元化、制度化，并非簡單的軍事合作強化，而是通過不同層面的軍事合作，有目的的促使美日同盟軍事功能外溢。軍事合作不僅是同盟條約內容的體現，更是同盟威懾對手的工具，也是同盟強化區域影響力的手段，進而构成美日同盟轉型的功能性特征——從單一的防禦型同盟向綜合性安全合作机制轉變。更爲重要的是，同盟功能的擴展并未止步于軍事領域，而是呈現出明顯的“議題擴容”趨勢。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關鍵技術管控、數據規則、標準制定等非傳統安全議題，被持續納入同盟合作框架之中。

2022年7月，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時任日本外相林芳正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小淵惠一舉行了美日經濟政策磋商委員會（EPCC）首次部長級會議，該會議也被成爲美日在經濟領域的“2+2”對話。對話涉及与經濟安全相關的各种問題，包括供應鏈彈性、半導體相關事項以及關鍵礦產。2023年1月的副部長級會議重点將打擊經濟脅迫和發展新興技術納入美日同盟合作的一部分。隨着美日經濟領域“2+2”會議的舉行，美日逐步重視在經濟安全領域的合作，此后，美日在經濟安全領域建立了各類合作机制，拓展了在經濟安全領域的合作範圍。2023年5月，日美商業和工業伙伴關系再次召開第二次部長級會議，重点討論經濟繁榮問題。代表團強調了双方之間在半導體生態系統的聯盟机制，并指出他們將鼓勵尚未建立的美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STC）和日本領先的邊緣半導體技術中心之間的合作，双方通過聯合

工作組來探索下一代半導體的發展，從而解決包括集中生產會破壞半導體供應鏈彈性等問題。在這次會議上，美國商務部和經濟產業省還決定增加其他新興技術問題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2024年4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訪問美國期間，兩國宣布，美國海洋和國際環境與科學事務局代理助理秘書和日本內閣府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秘書處副總干事簽署了一份通過科學和技術實現全球創新的諒解備忘錄，旨在共同承諾深化美日科技企業家之間的聯系，擴大投資機會，促進技術創新。在國際緊張局勢加劇、希望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的背景下，美國和日本認識到先進零部件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關鍵作用，正積極合作擴大各自的芯片制造能力。日本率先成立了一家名為Rapidus的新型芯片制造商，並與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成立了合資企業，以促進尖端邏輯半導體的開發。此外，日本還延長了相關技術補貼，以幫助美國內存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Inc.）擴大產能。與此同時，日本與荷蘭一致同意與美國的出口管制保持一致，從而限制向中國出售某些芯片制造工具。

“議程議題擴容”的本質，是同盟治理從單一安全維度轉向“綜合安全”與“全政府”模式：安全不再僅由軍事能力定義，而是與科技創新、產業鏈韌性、標準規則、關鍵基礎設施與輿論價值等要素發生強關聯。通過議題擴容，美日同盟獲得了更豐富的政策工具箱，使其外部功能不僅體現為威懾與防衛，也體現為對地區秩序與規則的塑造能力，並進一步強化對非軍事手段的制度運用，降低對單一軍事手段的依賴。

美日同盟的功能外溢一方面回應了大國競爭由軍事領域向經濟與科技領域延伸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同盟從單一安全安排演變為多層次、跨領域的制度網絡。通過將不同議題嵌入同盟機制，美日不僅強化了彼此之間的政策協調，也在事實上構建起一種對外具有排他性與規範約束力的制度空間，從而提升了同盟在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的結構性影響。

## 2. 美日同盟轉型的結構調整

二戰後，美國主導並建立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進一步追求自由主義霸權。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受到沖擊，特朗普奉行單邊主義

与貿易保護主義，在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同時也將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刃對准了美國的盟友，特朗普提出了“印太戰略”，指出美國的盟友体系是美國維護國家利益与世界秩序的重要資產，但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同盟政策不僅損害了亞太地區的同盟關係，也使美歐關係出現了裂痕。約翰·伊肯伯里在其著作《自由主義利維坦》中曾指出自由主義霸權的三種制度特征，即：首強國倡導了一種由談判而得的規則和制度構成的体系并在該体系中行事、首強國提供公共物品以換取他國支持、霸權秩序為相互溝通和影響提供渠道。<sup>7)</sup>很明顯，特朗普執政時期採取的對外政策不僅缺乏支撐自由主義霸權的制度特征，而且對已經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形成了打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日本賴以生存的國際環境的基本條件，日本國家利益的實現高度依賴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因此，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為了實現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目的，日本抓住了美國相對衰落、需要日本及盟友力量支撐美國對外戰略的契機，着手強化參與亞太地區与全球秩序的构建，同時積極轉變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從屬角色，力圖將日本由美日同盟当中的“輔助者”向“平手”轉變，甚至不斷謀求在美日同盟中的“平等地位”。可以說，對於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需求促使日本轉變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反過來，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轉變，也助推了日本樹立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大國形象。

#### (1) 日本角色配置發生層級重組

一方面，美國仍主導同盟走向。根據不同的地緣戰略价值和軍事技術水平，美國在印太聯盟体系中對盟友進行不同的角色划分，以將安全壓力和防務成本最大限度地轉嫁給盟友，從而以最低的成本在印太地區實現其“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愿景。<sup>8)</sup>日本位于美國的“第一島鏈”上，是美國在東亞安全架构中的地區樞紐，一直被美國視為具有重大戰略支點地位的核心盟友。<sup>9)</sup>為激發這個核心

7) [美]約翰·伊肯伯里. 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機和轉型[M]. 王緝思編, 趙明昊,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77.

8) 富田浩司. 第二次トランプ政権と日米關係—元實務家の視点から[J]. 安全保障研究, 2025, 6(4): 87-101.

9) Luis Simón, Alexander Lanoszka, and Hugo Meijer. Nodal Defence: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US Allia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9, 44(4): 360-388.

盟友更大的同盟行動力，美國不斷給日本“松綁”、對日本“放權”，在技術協作、軍事部署以及地區安全保障等方面給予日本更多的自主性，利用制度杠杆形成對日本的“逆向搭便車”，將過去由美國生產安全產品、日本消費的單向度模式調整為日本也生產安全產品、美國整合、美日共同消費的双向互動模式。<sup>10)</sup>在2017—2025年間，美國對日角色配置發生了層級化重組：一方面，在官方文件與戰略話語中，將日本從傳統意義上的“受保護者”與“基地提供者”提升為西太前沿的“安全產品提供者”、“地區安全網絡管理者”；另一方面，在作戰構想上則將日本定位為第一島鏈的“前沿緩沖—前沿支點”，要求其在常規威懾、彈道導彈防禦、遠程打擊與后勤支援等環節承擔更加主動的責任。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政府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先后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與美日聯合文件，在表述上有所差異，但總體上都指向同一方向：通過提升日本角色，減輕美國在前沿防務中的直接負擔。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對日本的“放權”并非僅僅源自于美國的主動性，近年來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也使美國不得不對日“松綁”，通過釋放日本的能力，借助日本的軍事防衛、經濟產業、科技實力等各方面資源補充美國“印太戰略”的力量投射，把美日同盟打造成美國“印太戰略”的支點，進而維持并強化美國全球範圍的領導權。

自“亞太再平衡”戰略提出后，日本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后無論是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戰略”，還是拜登繼承“印太戰略”、塑造印太同盟體系，日本始終是美國實施亞太戰略的核心支撐點，因此，基于日本在亞太戰略中的重要性，美國對日本時常採取一定程度的“妥協”政策。這種“妥協”并非單向度的讓步，而是嵌入在美國對盟友角色再分配的整体構想之中：一方面，通過在話語上承認日本“更平等”的同盟地位、鼓勵其發揮“地區領導力”，以增強日本對美國主導秩序的政治認同；另一方面，則在能力建設與任務分担上不斷“加碼”，要求日本在周邊海空域警戒監視、彈道導彈防禦、遠程打擊能力建設、后勤與基地開放等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將日方從“安全產品的純粹消費者”塑造為“前沿安全的聯合提供者”。特別是2017年以來，美國圍繞“反擊能力”、“一體化威懾”等議題的政策討論，實質上都在為這種角色轉換提

10) James D. Morrow. Alliance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 35(4): 908-913; 張翔, 王聯合. 美國對其亞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車”[J]. 國際展望, 2023(2): 41.

供規範与技術層面的正当性。

美國對日本進行盟友角色配置的結構含義在于：美國把“同盟不對称”從傳統的“能力弱”轉化為更可控的“分工差”。日本獲得更大行動空間，但這種空間往往以承擔更高的前沿責任、在小多邊机制中充當組織者与協調者為代價。因而，同盟內部的不對称并未消失，而是從“地位不平等”更多轉化為“責任壓力不均衡”。這也表明，盡管美國默許甚至支持日本發展“反擊能力”、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但這是建立在日本的政策取向對美國有利的前提下，并且伴隨着日本付出更多的同盟成本、承擔更多的同盟責任。美日同盟從顯性的非對称性轉向隱性的非對称性，美國在資源分配与決策布局等關鍵領域仍掌握主導權。

## (2) 日本積極推動國家戰略升級

与冷戰及冷戰后早期相比，日本在同盟中的功能性地位已發生顯著變化。日本不再僅是被動接受安全承諾的對象，而是逐步成為政策倡議者、能力投入者与地區議程塑造者。這種主動性体現在防衛政策制定節奏的加快、同盟議題設置範圍的擴大以及對區域安全議題表態与介入程度的提升等多个方面。

2025年2月，時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日美首腦會談前夕表示，“自由開放的印太”是日美共同擁有的，并強調“兩國在印太地區的合作”。<sup>11)</sup>日本是美日同盟的輔助施動者，一直以日美同盟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軸，<sup>12)</sup>在美日同盟机制運行中發揮協助塑造和政策協調的功能。從內部結構再造視角看，日本的“響應”不等同于對外跟隨行動本身，而在于：日本如何把對美協作轉化為內部制度性接口，如日本參與規劃、獲得信息、進入決策、承擔責任并据此議價，進而提升其在同盟治理中的可見度与不可替代性。近年來，為將美國留在東亞地區、確保美國對自身的安全承諾、實現自身正常大國地位，日本積極向美國推銷“印太”概念，追隨美國，輔助美國塑造“印太戰略”。<sup>13)</sup>日本在這一輪轉型中的

11) 「石破首相、法の支配の重要性確認へ 7日にトランプ氏と首腦會談」[EB/OL]. NHK, 2025-02-03,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50203/k00/00m/010/013000c>.

12) 「第二百五回國會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總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說」[EB/OL]. 首相官邸, 2021-10-08, [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_yomei.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_yomei.html).

13) 趙明昊, 美國“印太”盟伴体系中的日本角色探析[J]. 日本學刊, 2024 (4) : 1.

能動性，集中體現為“以同盟為杠桿的國家戰略升級”：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同盟鞏固安全承諾、提升威懾可信度；另一方面，日本又試圖把對美依賴轉化為對美議價，以制度化參與來支撐其“國家正常化”的長期方向。因此，日本并非單純的被動追隨者，而是在對美追隨、對外擴展與對內整合之間尋求一種可持續的政策組合。

### (3) “美日+X”模式應對中國崛起

日本通過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其他盟伴國家深化合作關係，不斷深化與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美國的印太盟國的關係，持續拓展與印度等美國的印太伙伴國的關係，進行雙邊政策協調，拓展“美日+X”，致力於充當美國印太同盟體系網絡化建設的協調者和黏合劑，將自身塑造為美國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的關鍵紐帶，強化美日聯盟粘性，積極配合美國以“美日+X”模式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全方位制衡。以日本助推美日韓三國達成三邊合作機制為例。2023年3月，韓國總統尹錫悅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了首腦會晤，日韓雙邊關係解凍，韓國向日本拋出橄欖枝並以在相關問題上的妥協與讓步為代價，使日本欣然接受並促使兩國關係大幅向前，這為日後美日韓三邊合作機制的達成奠定了基礎。2023年8月18日，拜登、岸田文雄和尹錫悅在戴維營舉行三邊領導人會議，會後發表了《戴維營原則》、《戴維營精神：美日韓聯合聲明》、《磋商約定》三份成果文件。從美國白宮發布的文件來看，戴維營峰會促使美日韓在經濟、安全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新共識，美日韓三邊合作機制呼之欲出。近年來，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明顯強化，並且呈現出程度加深、領域擴大和範圍延展等突出特點，這一態勢是美國謀求打造體系合力的意圖與日本謀求突破防衛限制的意圖和韓國謀求獲取可靠保障的意圖共同造成的結果。<sup>14)</sup>從結構再造角度看，日本的“政策協調”不僅是外交動作，更是一種同盟內部的功能升級路徑：通過把自身嵌入更多三邊與小多邊機制，日本既在外部網絡中提升存在感，也在同盟內部強化不可替代性，從而為其爭取更大制度話語權創造條件。但與此同時，協調者角色也意味着更高的政治與戰略風險暴露：當小多邊議題與地區熱點聯動時，日本更容易被推至前台，承擔更直接的壓力與更複雜

14) 王傳劍，王穎穎。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態勢、動因及前景[J]。東疆學刊，2025（4）：29

的危机責任。

#### (4) 日本加快追求“國家正常化”

21世紀初以來，日本加快追求“國家正常化”的腳步，在經貿、外交、安全領域採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實現日本國家利益、提升日本國際影響力的政策，以期盡早實現日本“國家正常化”的目標。為突破“專守防衛”限制，日本積極推動自身安全政策轉型，為美國主導下的印太聯盟體系注入軍事安全能量。<sup>15)</sup>譬如，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在發布《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計劃與志同道合國家展開合作，設立一個具有軍事安全威懾力的全新架構。自此開始，日本開始通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 機制對東南亞地區實施軍事技術滲透。2024年7月，日本與菲律賓簽署《軍事互惠准入協定》(RAA)，<sup>16)</sup>試圖通過與菲律賓的友好共享軍事訓練和行動，巧取菲律賓軍事基地的使用權，配合美國聯手打造“軍事小集團”和“共享軍事基地”，順勢“夾帶私貨”，將南海地區置于美日菲三邊聯合巡航的視野中。這均是日本積極配合美國，為美日同盟“一體化威懾”在印太地區的發力所展開的同盟主體實踐。

正是在功能與結構的雙重重塑中，美日同盟的新形態得以確立。同盟不再只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工具性延伸，而逐步演化為日本推進“國家正常化”與安全身份重塑的重要制度載體。通過同盟這一“合法化平台”，日本得以在不直接挑戰既有國際秩序的前提下，持續推動安全政策的邊界擴展。這一現實，也為理解日本近年來在軍事能力建設、法律解釋與戰略表述上的連續性突破，提供了關鍵的制度背景與分析框架。

從內部結構再造的終點看，“議程協商化”是把分擔與能力轉化為制度性權力的關鍵環節：只有當日本能够在議題生成、優先級排序與執行評估中獲得穩定參與，同盟才可能從“任務合作”進一步走向“治理共管”。但同樣重要的是，協商化并不必然帶來完全對等；其更可能形成一種“程序性共治——戰略性主導”的复合

15) 猿田佐世. 迫られる日米同盟のあり方 深化, 獨自防衛, 外交志向[J]. エコノミスト, 2025, 103(13): 34-35.

16) Signing of the Japan-Philippines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EB/OL].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4-07-08, [https://www.mofa.go.jp/s\\_sa/sea2/ph/pageite\\_000001\\_00432.html](https://www.mofa.go.jp/s_sa/sea2/ph/pageite_000001_00432.html).

結構：日本在程序與執行上更深嵌入，美國在方向與底線控制上繼續占優。

功能外溢與結構再造是美日同盟轉型的一體兩翼，美日同盟的外部功能再造，既是對安全環境變化的反應，也是對同盟治理方式的再設計，標志著其已從冷戰時期的防禦性安排，演變為服務於美國全球戰略與日本地區雄心的制度化聯盟平台。美日同盟內部的結構再造過程，既是權責重新分配的結果，也是日本安全自主化與美國戰略外包化的交匯體現。通過權責分担的均衡化、軍事能力的趨同化與政策議程的協商化，美日同盟正在向“准平等伙伴關係”演進，這一結構性調整將深刻影響同盟未來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正是在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日同盟發生了轉型並對外產生影響。

此外，功能外溢與結構再造相互耦合，結構再造為功能外溢提供基礎與動力，功能外溢又促使美日同盟進行更深層次的結構再造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以此形成“結構再造觸發功能外溢——引發外部環境變化——推動結構深度重塑——帶動功能外溢”的良性循環，最終推動美日同盟由單一的防禦型同盟向綜合性安全合作機制轉型，並為轉型提供持續的動力保障。

#### IV. 美日同盟轉型的趨勢與影響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在日本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當選首相，構成戰後日本政治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節點。與以往首相更替不同，高市早苗的上台並非漸進式政策調整的自然結果，而是在日本國內政治結構發生明顯鬆動、執政聯盟重組、國際安全環境顯著惡化等多重變量疊加下形成的制度性選擇。作為日本右翼保守政治的代表人物，高市早苗在安全觀、歷史觀與國家角色認知上，明顯延續並強化了安倍晉三時期的路線。其“自主國家”“現實主義安全觀”、“突破戰後體制束縛”等表述，本質上是對日本戰後安全身份的再定義。這一身份重塑並非以脫離美日同盟為目標，而是通過更深度嵌入同盟、提升日本在同盟中的功能性地位來實現。這一邏輯在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簽署的《聯合政權協議書》中得到了集中體現。該協議將“戰後最嚴峻複雜的安全環境”作為政策調整的起點，將提前修訂戰略文書、強化遠程反擊能力、推進次世代潛艇建設、自衛隊指揮體系整合等內容制度化，實質上為日本突破“專守防衛”的

解釋邊界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与政策路徑。這不僅意味着日本安全政策的前置化与進攻性增強，也意味着美日同盟在日本國內政治層面獲得了新的制度支撐。

從研究視角看，高市早苗政權的形成，使2017–2025年成爲觀察美日同盟轉型的一个高度凝練的現實收束点：一方面，美國在該階段完成了對“印太戰略”的制度化推進；另一方面，日本完成了從“能力補充者”向“功能共建者”的角色躍遷。這種內外條件的同步成熟，使美日同盟轉型具有階段性定型特征。

## 1. 美日同盟轉型的趨勢

2025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展開首次會談，宣稱美日關係迎來“新黃金時代”。此次會談建立了首腦互信關係，確認了特朗普對日本的重視態度，再次重申美方對日本的安全承諾。可見，美日同盟在特朗普2.0時期實現平穩開局。<sup>17)</sup>作爲雙方的政策共識，當前美日同盟機制正在加速強化，其主要內容一是美日同盟在美國印太聯盟體系中的定位軸心化，<sup>18)</sup>二是美國要求日本增強進攻能力，促進美日互動平等化和現代化，三是美日統合作戰指揮系統，實現軍事部署一体化。<sup>19)</sup>

### (1) 美日同盟軸心化趨勢

近年來，美日同盟在美國全球戰略體系和“印太”地區安全布局中的功能定位正在發生顯著轉變，以美日同盟爲“軸心”的戰略構想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愈發凸顯。這種“軸心化”定位不僅僅是單純的對僅有機制的機械延伸，而是以美日同盟爲中樞節点和輻射源，將美日關係超越以往的双邊防務框架，切入更广泛的多邊戰略架构，對美國的全球盟伴資源進行整合，优化軍事和外交資源，承擔聯結和主導多邊戰略架构的橋梁角色，爲鞏固美國“印太”霸權服務。

17) Taylor J.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Indo-Pacific Military Alliance System[J]. Asia Policy, 2025, 20(1): 61-64; 項昊宇. 美日打造“新黃金時代”成算几何? [EB/OL].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2025-02-12, [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502/t20250212\\_9492.html](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502/t20250212_9492.html).

18) 樊小菊. 美日同盟“軸心化”及其影響[J]. 現代國際關係, 2025 (1) : 67.

19) 廉德瑰. 美日同盟調整：現代化、一体化和多邊化[J]. 亞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4) : 37.

本質上，這是對美日同盟的根本性功能升級。基于此，以美日為核心的多邊議程正在以高密度和高強度展開。<sup>20)</sup>

## (2) 美日同盟現代化趨勢

儘管多年來美日官方層面并未對“美日同盟現代化”進行明確界定，然而在美日兩國都以中國為最大假想敵的共同認知下，不難理解該“現代化”的進程即，日本增強軍事作用、承擔更多責任，應對中國崛起，美日同盟在21世紀成為美國在東亞挑起針對中國、俄羅斯、朝鮮的“新冷戰”的工具。一方面，在同盟現代化框架下，美國積極鼓動日本提高軍事能力，為日本防務限制松綁。2022年12月，日本確定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安保相關文件，大幅增加防衛費，調整日本防衛結構，宣布日本擁有包括反擊能力在內的諸多新領域武器的能力。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決定強化西南地區的防衛體制，在該地區加強自衛隊的配備和自衛隊與海上保安廳的配合，通過強化政府部門間橫向合作構建國家全方位綜合方位體制。在美國看來，這是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轉變，拜登政府將日本國家安保戰略的調整和防衛費的新增肯定為同盟現代化貢獻。<sup>21)</sup>旋即與日本提出于此相符的同盟關係的強化意向。另一方面，為推動美日同盟結構現代化，兩國積極強化同盟協調水平，對美日同盟安全指揮控制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2024年4月美日首腦峰會上，拜登表示美日正在推動指揮與控制結構現代化，增強兩國部隊的互通性和規劃，以便它們能夠以無縫和有效的方式協同工作，並聲稱這是美日同盟自建立以來最重大的一次升級。美日同盟現代化本質上是機制化合作和能力建設的雙規推進。在制度層面，美日優化了“聯合指揮—信息共享—戰術協調”模式，引入跨域作戰概念，擴大聯合指揮機構權限，實現海、空、網絡、太空等多域統一作戰圖景。在能力建設層面，美國賦能日本在訓練、武器系統集成和後勤保障上的能力提升，例如引入“戰斧”導彈系統並同步升級火力控制與目標指派體系，建立常態化聯合火力演練與信息化

20) Jae Jeok Park. American coalition building of the US-led security network in the Indo-Pacific: US influence-building measure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5, Vol.(79):570-585.

21)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EB/OL]. National Archives, 2023-01-1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13/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and-japan/>.

指揮驗證機制。

### (3) 美日同盟一体化

美日同盟的一体化，即同盟指揮和控制系統的重組、情報關係和網絡安全的強化、以及國防工業和技術合作的深化。<sup>22)</sup>第一，同盟指揮和控制系統的重組。<sup>23)</sup>2022年12月，日本在“安保三文件”中首次提出构建“統合作戰司令部”的想法。2024年4月，時任美國駐日大使拉姆·伊曼紐爾 (Rahm Emanuel) 称，“即將召開的美日峰會意味着一个時代的結束和另一个時代的開始——過去以聯盟保護為特征的美日同盟，如今則轉向了向地區投射聯盟，美日同盟正在由過去的防禦性同盟轉向進攻性同盟，”“即將進入的時代激勵美日改變已經存在60年的指揮結構，日本應該考慮建立一個聯合指揮作戰中心”<sup>24)</sup>同在4月舉行的美日首腦會談中，雙方就升級各自指揮控制框架達成共識。2024年5月，日本參議院批准設立統合作戰司令部。2024年7月，美日在“2+2”會談中宣布防務關係的重大變化，“美國將把駐日美軍升級為聯合部隊總部，擴大任務和行動責任。這將是美軍駐日部隊自成立以來最重大的變化，也是70年來美日軍事關係的最有力改善之一”。此舉旨在補充日本新的聯合作戰司令部的能力。2025年3月，日本防衛省新設統合作戰司令部，負責對陸海空自衛隊進行一体化指揮，以及對接協調駐日美軍，這是日本自衛隊指揮體系調整的重大標志。第二，情報關係和網絡安全的強化。從美日兩國情報關係和網絡安全合作的實踐判斷，美日情報合作主要呈現兩個發展趨勢。第一，美日兩國積極將情報合作由雙邊向小多邊拓展。譬如，在美國的呼喚下，日本表現出對加入美國主導的“五眼聯盟”的強烈意願，頻繁與“五眼聯盟”成員國展開戰術情報演練等一系列軍演，積極融入美西方情報乃至安保防務體系。2024年10月，日本自衛隊首次受邀參加在加拿大舉行的“五眼聯盟”軍方代表會議。同年11月，“五眼聯盟”首次

22) Thomas Wilkins. Towards cross-regional alliance integration: exploring the modes and modalities of 'Coalition-Building' around minilateral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5, 79(3): 493-502.

23) 小谷哲男. 未來への回歸: 日米同盟における指揮統制關係強化の意義[J]. 國問研戰略コメント, 2025: 1-2.

24) US Ambassador to Japan speaks to NHK ahead of Japan-US summit[EB/OL]. NHK, 2024-04-05,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backstories/3219/>.

在日本舉行會議。<sup>25)</sup>第二，美日情報合作所搭建的機制呈現多維立體的特征。“多維”，即包括海、陸、空、網絡等多重空間維度；“立體”，即涉及情報共享、交換、分析、技術和保密等多層級情報合作平台。第三，國防工業和技術合作的深化。2024年4月，美日領導人在白宮達成旨在提升兩國防務安全合作水平的70項合作協議。根據協議，美日計劃繼續合作研發“滑翔階段攔截器”以應對高超音速導彈威脅，鞏固雙方彈道導彈防禦合作，與澳大利亞共同構建“網絡化”防空與彈道導彈防禦體系；利用各自軍事工業基礎，深化兩國國防工業合作，強化包括防空導彈和其他攻擊型導彈在內的聯合國防生產能力。2025年3月，美日達成共識，將加快日美聯合生產超視距空對空AMRAAM導彈的計劃，並考慮合作生產SM-6地對空導彈，以幫助緩解彈藥短缺問題。

儘管特朗普兩次執政對日美同盟產生沖擊，但日本錨定日美同盟的戰略穩定性和戰術性調整為美日同盟“一體化”升級提供了動力。此外，特朗普再次執政後仍將美日同盟視為“印太戰略”的基石，也推動了美日同盟“一體化”升級。<sup>26)</sup>面向未來，美日同盟大概率沿着“軸心化—現代化—一體化”的路徑繼續推進，但其擴張性轉型將同時受到國內政治約束、財政與產業能力瓶頸、危機情境下的風險可控性以及盟伴體系協調成本等因素制衡。

## 2. 美日同盟轉型的影響

美日同盟機制的新一輪升級和強化，必然有利於美國的“印太”地區霸權護持和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戰略實施，是美日兩國聯手作用的結果，正在沖擊多邊合作、惡化安全局勢、加速陣營對立，成為亞太地緣政治和地區事務的最大干擾和消極因素。

### (1) 對地區合作的銷蝕

當前，美日同盟共同致力於在印太地區構建所謂“自由與開放”的國際秩序，

25) If ever invited, should Japan make it 'Six Eyes'?[EB/OL].The Japan Times, 2024-11-30, <https://www.japantimes.co.jp/commentary/2024/11/30/japan/japan-six-eyes/>.

26) 黃大慧，孟繁超，戰略錨定與戰術調整：“特朗普沖擊”與日美同盟“一體化”[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5(4)：28.

是對后冷戰時代較為穩定的亞太地區框架的破壞。21世紀以來，亞太地區多邊合作進程穩步推進，東亞地區經濟增長成為全球領頭羊，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美日同盟所推崇的“印太秩序”崇尚“小圈子”，挑起大國競爭，與亞太地區原本有序穩定的多邊合作進程完全背道而馳。<sup>27)</sup>一方面，美日同盟的“印太”理念和小多邊合作正在破壞亞太區域合作和治理的共識和理念。另一方面，美日同盟的“印太”理念和小多邊合作正在削弱東盟在亞太的地位。

## (2) 削弱地區和全球穩定

介入地區安全是美日同盟機制強化的重要路徑。一方面，美國在日本的輔助下，頻頻插手地區事務，導致地區安全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域內國家之間擦槍走火的風險不斷上升。以南海爭端為例。在美日不斷強化與菲律賓的雙邊和三邊合作的同時，菲律賓馬科斯政府開始在與中國的南海爭端的採取更加强硬的立場。在美日兩國的鼓動下，馬科斯政府不斷提升對中國尋釁滋事的頻率和力度，導致南海地區安全風險驟升。另一方面，日本助力美國與北約盟友聯動的增強，導致亞太地區安全局勢更為複雜。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動引起了北約的關注，以共同應對中國為切入點，北約同時深化與日韓澳新等亞太伙伴國家的合作，將戰略目標擴展至亞太地區，呈現北約亞太化趨勢。北約本就是冷戰思維的產物，其染指亞太地區事務，將會加劇亞太地區伙伴關係“安全化”，提升“陣營化”對抗風險。特別是北約參與亞太地區事務的根本動因在於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遏制中國，這還將激化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北約亞太化增添了中美博弈的軍事化色彩，北約以中國為關注對象，制造新對手，捆綁中俄，顯然是重蹈陣營對立的覆轍，勢必削弱地區和全球穩定。<sup>28)</sup>

## (3) 打破地區戰略平衡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將台灣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高市早苗的言論具有一定的挑釁性，

27) 徐万胜, 高宏宇.論“美日+”小多邊合作的同盟化趨向[J].日本學刊, 2024 (2) : 17.

28) 孫茹.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約亞太化[J].現代國際關係, 2022 (7) : 59.

也為日本安保政策的調整理下前提。隨後，日本首相官邸高官發表擁核言論，擬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取消對武器出口的5種類限制，放風修改“無核三原則”，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言論預示着日本的政策轉向，這種政策轉向帶來了日本動搖戰后國際秩序的風險，不僅受到國內的批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警惕。美國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響較大，特朗普二次執政后，美國始終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調整外交政策，美日同盟仍將強化。但在當前條件下，穩定中美關係，防止中日關係緊張升級更符合美國利益。因此，高市早苗想要完全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則”和“無核三原則”仍會受到限制，原因之一是日本無法在未經美國授權或默許的情況下實現防衛態勢的調整。加之日本先進武器多來自美國，因此日本的軍事姿態，极大程度上是日本自主需求和美國戰略推動的共同結果。對整個亞太地區來說，高市早苗的安保政策“增添了日本與鄰國的安全兩難，削弱了政治互信”，高市推動的修憲強軍計劃若得以推進，將打破地區戰略平衡，引發周邊國家連鎖反應，最終將進一步使亞洲國家總體防務費用增長，引起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的失控。

## V. 結語

總體而言，美日同盟的轉型并非孤立發生的地區性事件，而是全球權力結構深刻調整在東亞地區的集中投射。其本質，是在大國力量對比變化、戰略競爭機制外溢以及國際秩序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同盟體系為維持自身有效性而進行的制度性再造。本文將 2017 年至 2025 年間美日同盟轉型作為研究對象。在時間範圍上，分析聚焦 2017 年至 2025 年這一階段，主要基于三方面考慮：其一，2017 年標志着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從“反恐中心”向“大國競爭中心”系統性轉向。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正式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并在此前奧巴馬“亞太再平衡”的基礎上提出“印太戰略”，美日同盟自此被嵌入以對華競爭為核心的印太同盟網絡，美方對同盟的功能、任務和地理視野進行了再定義。其二，日本在 2010 年代后期至 2020 年代初相繼推動安保法制整備、《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以及“反擊能力”等重大政策調整，在美方推動下完成從“專守防衛”向“進攻性防衛”

和“地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轉換，美日同盟由此進入一個在性質、職能與結構上發生深層變化的新階段。其三，以 2025 年作為時間截點，一方面可以囊括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政府以及特朗普重返白宮初期三屆政府對美日同盟再定位的連續過程，觀察同盟轉型在不同政府之間的延續與差異；另一方面，也為快速演變中的政策實踐劃定一個相對清晰的觀察窗口，避免對未來動向作出超出材料支撐的預判。

從2017年至2025年的演進軌跡看，美日同盟已經完成了從“安全強化”向“結構轉型”的關鍵跨越，其內涵、功能與外延均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首先，從持續性看，美日同盟的轉型具有明顯的長期性與路徑依賴特徵。一方面，其轉型並非依賴單一政權或個別政策突破，而是通過戰略文件修訂、制度機制嵌套、能力建設累積等方式逐步固化；另一方面，安全、經濟、科技與價值觀等多重議題的疊加，使同盟形成了較強的制度韌性。這意味着，即便未來日本或美國出現政權更替，同盟轉型的總體方向亦難以發生根本性逆轉。

其次，從政治條件看，高市早苗政權的出現，使這一轉型在日本國內政治層面獲得了新的制度動能。與以往“漸進修補式”的安全政策調整不同，高市政權在意識形態與政策表述上更加直接地對戰後體制提出挑戰，並通過執政聯盟協議、戰略文件前置修訂等方式，將同盟轉型嵌入日本國家治理框架之中。這不僅加快了日本安全政策突破既有邊界的節奏，也使美日同盟在對華戰略上的指向性更為清晰。

再次，從地區影響看，美日同盟的轉型正在重塑東亞安全結構的運行邏輯。同盟不再僅承擔“穩定器”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結構塑造者”的角色，其行為外溢效應正在加劇地區安全困境。這種變化，使東亞地區由“低制度化安全競爭”向“高制度化陣營對峙”滑移的風險明顯上升。

因此，美日同盟的轉型並非一個單向度、線性推進的過程，其具體路徑、節奏與強度仍將受到美國戰略重心、日本國內政治約束、地區國家反應以及突發性危機等多重變量的制約。但可以確認的是，同盟已進入一個難以回退的結構性調整階段，這一現實構成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變化的重要背景。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政策回應不應局限于對美日同盟的直接反制，而應着眼于結構塑造。首先，在中美關係層面，應堅持避免戰略誤判與強化危機管控，防止派生性危機將結構性競爭推向失控狀態。其次，在中日關係層面，應充分

利用經濟與社會聯系的高度互嵌性，削弱同盟政治對雙邊關係的擠壓效應。再次，在周邊外交層面，應通過深化與俄羅斯、中亞、東盟、南亞及韓國的合作，構建多層次戰略緩沖帶。總之，中國的關鍵挑戰並不在於如何“阻止”美日同盟轉型，而在於如何在既有結構中保持戰略主動，避免被動承壓，並逐步塑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地區環境。

## | 参考文献 |

- [美]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M].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美]斯蒂芬·沃爾特.聯盟的起源[M].周丕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美]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与紛爭[M].蘇長和,信強,何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美]約翰·伊肯伯里.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轉型[M].王緝思編,趙明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7.
- 張翔,王聯合.美國對其亞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車”[J].國際展望,2023(2)
- 趙明昊.美國“印太”盟伴体系中的日本角色探析[J].日本學刊,2024(4)
- 王傳劍,王穎穎.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態勢、動因及前景[J].東疆學刊,2025(4) 樊小菊.美日同盟“軸心化”及其影響[J].現代國際關係,2025(1)
- 廉德瑰.美日同盟調整:現代化、一體化和多邊化[J].亞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4)
- 徐万胜,高宏宇.論“美日+”小多邊合作的同盟化趨向[J].日本學刊,2024(2)
- 孫茹.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約亞太化[J].現代國際關係,2022(7)
- Robert Axelrod,Robert O.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J].World Politics1985,38(1)
- Luis Simón,Alexander Lanoszka, and Hugo Meijer.Nodal Defence: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US Allia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019,44(4)
- James D. Morrow.Alliance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1,35(4)
- Jae Jeok Park.American coalition building of the US-led security network in the Indo-Pacific: US influence-building measures[J].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5,20(79)
- Thomas Wilkins.Towards cross-regional alliance integration:exploring the modes and modalities of 'Coalition-Building'around minilaterals[J].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5,79(3)
- Taylor J.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Indo-Pacific Military Alliance System[J].Asia Policy,2025,20(1)
- 小谷哲男.未來への回歸:日米同盟における指揮統制關係強化の意義[J].國問研戰略コメント,2025.
- 富田浩司.第二次トランプ政権と日米關係—元實務家の視点から[J].安全保障研究,202

5,6(4):87-101.

猿田佐世. 迫られる日米同盟のあり方 深化, 獨自防衛, 外交志向[J]. エコノミスト, 2025, 103(13):34-35.

項昊宇. 美日打造“新黃金時代”成算几何? [EB/OL].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2025-02-12, [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502/t20250212\\_9492.html](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502/t20250212_9492.html).

Japan-U.S.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Summary). [EB/OL]. Ministry of Japan, 2025-10-29,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5/10/4ab6149fd4e68a6271987229f9ce7ed3fb843a68.html>

Japan-U.S.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Summary). [EB/OL]. Ministry of Japan, 2026-1-15,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6/01/e2fd534c81a42087e8511c8ca6961c1cbf863a46.html>

Signing of the Japan-Philippines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EB/O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4-07-08, [https://www.mofa.go.jp/s\\_sa/sea2/ph/pageite\\_000001\\_00432.html](https://www.mofa.go.jp/s_sa/sea2/ph/pageite_000001_00432.html).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B/OL]. National Archives, 2023-01-1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13/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and-japan/>.

US Ambassador to Japan speaks to NHK ahead of Japan-US summit [EB/OL]. NHK, 2024-04-05,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backstories/3219/>.

「石破首相、法の支配の重要性確認へ 7日にトランプ氏と首脳會談」 [EB/OL]. NHK, 2025-02-03,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50203/k00/00m/010/013000c>.

「第二百五回國會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總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說」 [EB/OL]. 首相官邸, 2021-10-08, [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_nhyomei.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_nhyomei.html).

| 논문투고일 : 2026년 01월 16일 |

| 논문심사일 : 2026년 02월 21일 |

| 게재 확정일 : 2026년 03월 07일 |

| ABSTRACT |

**Japan-US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Function-overflow, Structural Adjustment, Trends and  
Impacts (2017-2025)**

**BA Dian-jun**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WANG Han**

(Northeast Asia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Jilin University)

**GENG Fei-man**

(Northeast Asia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Jilin University)

From 2017 to 2025, under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continuous tension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East Asia, and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Japan alliance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t shifted in terms of external function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influence. The US-Japan alliance transformed from a traditional defensive alliance to a composite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regional shaping capabilities, 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xternal function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function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have spilled over beyond its original scope, manifested in the advancement and expansion of its military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topic expansion" based on thi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gradual evolution from a "highly asymmetrical" state to a "quasi-equal division of labor". After Sanae Takaichi took office, the political ecosystem in Japan evolved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comple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demonstrated a phased stabilization feature. In the future, the US-Japan alliance will continue to transform towards strategic deployment axis central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alliance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security. This process will also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 Keywords: US-Japan Alliance,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Indo-Pacific Strategy

